



鲁迅和他的论敌

一个都不宽恕

陈漱渝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的忍耐可谓多矣，
倘有人问起我来，
怎么回答呢？我想
了一想，决定的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
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並未举行，

这是

们	么	我
们	回	的
怨	答	怨
么	呢	了
，	？	谓
我	我	多
也	想	笑
一	了	，
个	一	满
都	想	有
？	，	人
宽	决	问
恕	定	起
。	的	我
	是	来
	：	，
	宽	坐
	他	

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和他的论敌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和他的论敌/陈漱渝主编。—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9

ISBN 7-5059-2540-7

I. 一…… II. 陈… III. ①鲁迅著作: 评论著作—选集②鲁迅著作—研究—参考资料 IV. 1210.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8255 号

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和他的论敌
陈漱渝 主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 印张 4 插页 576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300 册

*

ISBN 7-5059-2540-7 定价: 29.80 元
I·1880



在上海景云里寓所的书斋
1928年3月16日摄



1909年摄于日本东京



鲁迅五十三岁生日全家合影
1933年9月13日



编完《前哨·纪念战死者
专号》后与冯雪峰一家合影
1931年4月20日



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
会上 1936年10月8日



左联纪念鲁迅五十寿辰时摄
1930年9月17日



鲁迅五十岁生辰照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



毛泽东与章士钊

毛泽东誉鲁迅为现代圣人。
鲁迅看到章士钊三个字就摇头。



田汉毕竟多了几分艺术家气质



周扬后来赞鲁迅曰：横眉俯首，
百代宗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留日时的夏衍。他始终认为鲁迅不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郭沫若（右起第二人），化名“杜荃”，宣布鲁迅是“二重反革命”。



白璧德的中国门徒—梁实秋



1927年2月，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



英國文學系講師

吳宓先生

学衡派主将吴宓



憨厚的阳翰笙虽着洋服，
但不显“气宇轩昂”的傲气。



青年时代的高长虹

狂飚文人高长虹，这是他家
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宣布“阿Q时代已经死去”
的阿英



法律學系教授
燕樹棠先生

《现代评论》杂志主要作者燕树棠



被现代评论派人士誉为“诗哲”的徐志摩



顾颉刚在香山（1966年）

命鲁迅“以俟开审”的顾颉刚



法律學系教授
王世杰先生

《现代评论》杂志的主要负责人王世杰



政治系主任
鯁生周覽先生

《现代评论》作者、法学家周鯁生



施螫存

劝青年从《庄子》、《文选》
里找活字汇的施螫存



徐懋庸

“雄纠纠打上来”的徐懋庸。
他是否集湖北人的鯁直与好斗
于一身？



英國文學系教授

“正人君子”陈西滢



“第三种人”杜衡



戴望舒

《法国通讯》的作者戴望舒。戴望舒把“第三种人”视为“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引发鲁迅的批驳。



冯乃超说，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五四期の胡适

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胡适

序· 狼 的 伤 吟

陈漱渝

六十三年前，瞿秋白在他那篇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把鲁迅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莱谟斯——一位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

这是一个确当并为鲁迅本人所首肯的比喻；因为鲁迅虽然出身于绅士阶级，却从中国劳苦大众的母体上吮取着精神养份。他涤除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给中国传统知识份子铸就的奴才式的家畜性，而具备了反叛一切邪恶势力的野兽性，最终成为了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从头到脚都是纯钢打成的民族英雄。

绅士阶级的卫道士对于本阶级的叛逆者是深恶痛绝的。鲁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其实是知识阶级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级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份子如此恨我。”

那些对鲁迅作品浅尝辄止的人们常有一种误解，认为鲁迅尖刻，好斗，没有包容慈善的胸怀。其实，鲁迅待人是宽厚的，也很少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倒是那些反对过鲁迅的人们，对鲁迅采用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在政治上给鲁迅栽脏，扣帽子：说鲁迅靠日本特务的津贴出书，或被金光灿灿的卢布收买，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在学术成就上对鲁迅进行贬损：说鲁迅小说只有一两篇可取，鲁迅杂文喊喊噪

喉，挑是拨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之作，读鲁迅的译文比读天书还难，鲁迅的文风是“流氓风格”……甚至还用污言秽语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说他“醉眼朦胧”“南腔北调”“满口黄牙”……个别对鲁迅恨之入骨的人，更以撤职、起诉、呈请通缉等方式对鲁迅进行迫害。直至临终前不久，鲁迅还梦见有人埋伏在两旁，准备在暗中对他的进行偷袭。在世界文豪当中，象鲁迅这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者，恐怕是绝无仅有。

面对五花八门的攻击，鲁迅最初采取的态度往往是隐忍退让——尤其是对青年，更默然甘受损失。直到退避到棺材里还有戮尸之虞，他才奋起反击。所以，鲁迅论争文字留存的“纸上声”，其中自然不乏战叫，但的确也夹杂着被咬噬之后的伤吟，恰如他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中所言：“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然而，由于鲁迅是一位终生荷戟、寐不卸甲的战士，所以在他全部遗著中，最闪光的也正是他那些“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论争文字。这恰如他对章太炎先生遗著的评价：“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众所周知，最早为鲁迅赢得文坛声誉的是他的小说；而鲁迅日后的作品又有力地证明了他具有纯熟驾驭各类文体的卓越才能。但鲁迅终生选择的主要文学样式却是杂文。究其原因，无疑因为杂文是一种战斗的文体，更加适合于鲁迅的战士本色和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鲁迅将他作为哲人的睿智和作为诗人的激情全部溶入到他的近千篇杂文当中。他既吸取了英国随笔（Essay）刑制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文章“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使杂文这种文体成为了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利器，给封闭僵滞的旧中国注入了活力和生机。由于五四新文化

运动肩负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历史重任，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大多围绕这一时代主题展开，尤其是他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更为深刻，犀利，具有内在系统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多变。鲁迅置身于反击国民党政权文力征伐的前哨——上海，面临明明暗暗的敌人，他更加重视发挥杂文这一武器短兵相接的功能，作品的主题也因之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针对性。鲁迅创作小说、散文、散文诗乃至发表学术讲演（如《魏晋风度与文章及酒与药之关系》），也往往是为了表达他的思想和战斗哲学，决非“为艺术而艺术”或“为学术而学术”。

五四时期中国现实社会中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反映在文学领域就形成了提倡白话文的激进派与维护文言文的守旧派的斗争。在这场论争中，鲁迅“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热风题记》），也就是说，鲁迅并没有跟旧文学营垒的所有代表人物都展开正面交锋，而只是集中火力对付那些“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人物，如《学衡》派、《甲寅》派诸公。

《学衡》派以留美学生为骨干，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帜。与“孔教派”“国粹派”的不同之处是，《学衡》派的学者主张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但在维护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维护旧文化中恒定的精神价值等方面，《学衡》派则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稳定的同盟军，同样的是阻挡五四新文化潮流的顽石。《甲寅》派代表人物章士钊也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辛亥革命前主持《苏报》，倡言革命，颇为人们称道，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却一变而为皖系军阀的高级幕僚，并利用他担任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大权，镇压爱国运动，明令尊孔读经，其危害更甚于《学衡》派。

在跟《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过程中，鲁迅没有跟对手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扭打，在一些名词概念上兜圈，而主要凭借自

已谙熟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戳穿这批自炫渊博的旧文学的卫道者“文且未亨，理将安托”？如他在《估〈学衡〉》一文中，也只不过从该刊中随手拾来若干未通的字句，就“衡”出了他们的铢两，让这些跟国粹谬托知己的人窘态毕现。在《答KS君》《再来一次》等文中，鲁迅以实例证明章士钊乱用成语，错解典故，文字庞杂，陋弱可哂，使他企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的角度证明文言文优越的图谋彻底破产。由于《学衡》派的人物尊杜威、罗素而贬马克思，而章士钊当时更是段祺瑞执政府中的核心人物，这就使得鲁迅跟他们论争的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而带有思想批判和政治斗争的性质。

如果说，在鲁迅眼中，《学衡》派、《甲寅》派的人物“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答KS君》）；那么，跟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则是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鏖战激烈的重大战役。现代评论派跟中国现代的其它文艺社团一样，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现代评论》周刊的作者也倾向不一，流品不齐；但就其核心成员而言，则是一群曾沐浴欧风美雨又身着五四衣衫的学者。他们在政治上持自由主义立场，标榜精神独立，平和公正，不尚攻讦，但在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他们的舆论客观上却偏袒站在爱国民众对立面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他们在文章中有时也流露出对旧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但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比照中常流露出民族自卑感和媚外崇洋的心态。鲁迅跟现代评论派的矛盾，除了源于他们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的深刻分歧外，还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中庸与反中庸的分歧。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跟以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成员的论争，标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这场论争虽然常围绕在一些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展开，但同样具有不容低估的政治意义。

鲁迅跟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围绕革命文学展开的论争，是中国革命文学阵营内部进行的第一次大论争，也是对鲁迅思想发展最具意义的一场论争。创、太两社的年轻作家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中奋起，两眼喷发出向屠杀者复仇的怒火，首先在战友的血泊中撑起了革命文学的战旗，其历史功绩自然是不能抹杀的。但这群认为自身就是革命、立志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事务的作家却对中国国情十分隔膜。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盲动主义影响，文艺上照搬苏俄拉普学说和日本福本主义的观点乃至词句，因而错误地把长期关心文艺和革命关系问题的鲁迅作为了“革命文学”的祭旗人。论争中涉及的那许多艰深的理论问题迫使鲁迅认真阅读了大量科学的文艺理论著作，纠正了他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在论争中就文艺与宣传、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革命人”与“革命文学”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意见，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

革命文学论争的积极结果，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左联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但却是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中度过的。鲁迅以左联盟主身份参与过三次论争，其中第一次是跟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的论争。

梁实秋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忠实信徒，新月派的主要批评家。鲁迅跟他的论争主要围绕文学中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进行。需要澄清的是，梁实秋并非简单化地否定阶级性、阶级斗争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只是强调“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偏见集·人性与阶级性》）；人性与阶级性有轻重表里之分；文艺与政治虽有关系，但文艺表现的只是政治生活的背景。由于梁实秋肯定现存资产制度的合理性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左翼文艺运动，在文章中过多强调人性中共同的亘古不变的成份而对阶级性时有简单的排斥，因此新兴的左翼文艺阵营跟他的论争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鲁迅也并非一般地否定人性，而只否定抽象

不变的人性。他在论争中将深刻的人生经验及其感情体验用于理论说明，独具慧眼的戳穿了梁实秋杂糅着封建等级的人性论与资产阶级自然人性论的矛盾空虚，使整个论辩过程有声有色，高潮迭起，有力地动摇了新月派文人的理论基础。据冯雪峰回忆，这是鲁迅参加左联后以最愉快的心情打的第一仗，表明了鲁迅自我思想斗争的胜利和快乐。

继新月派之后向左翼文艺进攻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这是国民党政府为配合军事“围剿”而发动的一场文化“围剿”，其基本队伍中没有几位象样的文人而以暗探、特务、军官、党棍为其骨干。其宗旨是取缔文艺民主而使文艺统一于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专制。由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无理论可言，鲁迅在论争中仅仅揪出他们的几部代表作（如《陇海线上》《黄人之血》）进行示众，证明他们的政治目标是要“日支亲善”，消灭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上是在“民族主义”旗帜的掩护下出卖民族利益。由于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揭露，“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开场不久即偃旗息鼓。

与所谓“第三种人”苏汶（杜衡）的论争是鲁迅加入左联后被卷入的第三次论争。这场论争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和革命文艺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问题。苏汶是作为胡秋原的间接支持者参加论争的。在他看来，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自由主义的、非功利的创作理论，而左翼文坛则持一种目前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创作理论。他所说的“第三种人”并非指政治上的中间派，而是指那些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互不让步的文艺观面前一时感到无所适从的作家。他指责左翼文坛只要行动，不要理论；只要革命，不要文学；只要煽动，不要艺术。苏汶的观点虽然在某些程度上触及了左联常犯的机械论、简单化、左倾关门主义等错误，但他把新文学创作的障碍主要归之于左翼作家的“左而不作”和“第三种”人的欲作而不敢，却放过了摧折进步文艺新芽、奉行文化